

城市权利、政府责任与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新思路*

CITY RIGHTS,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IES AND NEW THOUGHTS ON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魏立华 丛艳国 魏 成

WEI Lihua; CONG Yanguo; WEI Cheng

【摘要】地理学、城乡规划学等学者较少关注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对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影响；考虑到国家在新型城镇化方面的政策走势，“地方发展型政府”将趋于弱化。本文尝试从城市权利、政府责任、财政社会性支出等视角，充分考虑城市常住人口市民化以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等的潜在影响，提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三个趋势，第一，“城市尺度上以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供给”向“包容性的多样化社区需求的满足”转变；第二，城市层面上的“公众参与式预算”以及社区层面上的常住人口的“城市权利认可”；第三，对于“城乡规划中的选择性实施”的监管与督察。

【关键词】城市权利；政府责任；人居环境

ABSTRACT: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s of geography and urban planning generally pay less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n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produced by transition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New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role of “local-development-oriented government” will be gradually weake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including city rights,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ies and public finance expenditur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primary tendencies in construction of human settlements on the basis of a full consideration over the potential influences of citizeniz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and democratization of government’s decision-making. The first tendency is the transition from “infrastructure supply that is dominantly from investment at the city scale” to “fulfilling demands of diversified communities in an inclusive way”; secondly, the adop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urban-level budget expenditure” and the “recognition of city rights” to urban residents at the community level; thirdly, the monitoring and inspection over

“selected implementation of urban-rural planning.”

KEYWORDS: city rights;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urban human settlement

人居环境是人类社会的集合体，包括所有社会、物质、组织、精神和文化要素，涵盖城市、乡镇或农村(UN, the Vancouver Declaration on Human Settlements, 1976)；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结合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发展态势，吴良镛^[1]提出要从全球、区域、城市、社区(村镇)、建筑等五个层次展开人居环境科学的系统研究。但从地理学、城乡规划等学科的研究视角来看，主要集中于人居环境空间差异及评价、人居环境系统综合性研究、人居环境景观研究、人居环境模拟与预测、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地理信息科学对人居环境的技术支撑研究等方面^[2]，而从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层面，分析人居环境发展的“制度支撑”的研究仍较弱。

1990年代初期以来，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作为“后社会主义转型(post-socialist transition)”的主导意识形态，不断加强日常生活质量的进攻，城市成为永无止境地消化过度积累资本的受害者，城市生活质量已成为一种有钱人的商品^[3]。列斐伏尔更是提出，“我们的政治任务就是构思和重建一种完全不同的城市”；Wu F^[4]提出“转型城市(transitional city)”要与“转型经济(transitional economies)”，尤其是与强大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相联系，从政治经济系统运行机制，而非土地开发或住房供给等角度来阐释城市转型过程。基于此，若城市人居环境研究要回答“我们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101147)；“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完善与使用功能拓展关键技术研究示范”(2014BAL06B02)。

【文章编号】1002-1329
(2015)03-0009-06

【中图分类号】C912.81;F812.4;
TU9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19/cpr20150303a

【作者简介】

魏立华(1977-),男,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教授。

丛艳国(1976-),女,博士,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与风景园林学院,副教授。

魏成(1972-),男,博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教授,本文通讯作者。

【修改日期】2015-03-06

里”这样一个问题时，就务必首先回答以下这类问题：我们对城市有着怎样的权利或权利束，我们在城市试图构建怎样的社会关系，怎样思考政府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失衡中的责任问题，在政治经济系统运行机制发生转型的过程中，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方向在哪里？

1 我们对城市有着怎样的权利或权利束？

“空间是政治性的，它一直都是政治性的”^[5]。在一个不平等的等级社会，城市政体(urban regime)本质上已成为拥有资本和权力的利益集团实现自己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工具，而城市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成为被忽视最多的一项权利。城市权利是一种按照我们的期望改变和改造城市的权利，它是一种集体的权利，而非个人的权利^[6]，这是由宣扬私人物权和追求利润要高于所有其他权利的新自由主义所长期压制的一种诉求。勒菲弗认为“城市权利”是：谁拥有城市的问题，“拥有”不是个人直接拥有一份物业意义上的拥有，而是每一个群体集体意义上是否能够获得就业与文化，居住在一个合适的住宅里，拥有适当的生活环境，获得满意的教育，获得个人的社会保险，参与城市管理；不难看出，勒菲弗的“城市权利”不仅仅涉及城市的物质空间，更涉及不同群体获得城市生活和参与城市生活的更为广泛的权利，涉及平等使用和塑造城市的权利。

城市权利与社会正义相关，更是一个空间问题。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社会关系、社会权利的不平等，是当代城市权利的根本问题，对于正处于快速城市化、仍在向新自由主义转型的中国城市而言尤为明显。空间权利已成为城市规划的焦点，不能以空间形式实现的权力，不具有真实性^[6]，以如何提升城市生活质量为核心议题的人居环境研究，首先就成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城市不同的空间权利的斗争话题，如2011年6月的广州市新塘事件以及广州市同德围公共服务长期缺失问题。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 2020年)》提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但不可否认的是，自城市建立以来，城市一直是通过剩余产品的地理和社会聚集而发展的，仅有少数人可以控制这些剩余产品的使用，城镇化一直是一种阶级现象^[3]，其后果同样具有政治性；能否合理地认识和推进城市权利，已经成为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质量与方向的一个重大问题。城市权利是一种首位权利，不仅仅是进入城市的权利，更是参与城市运行的权利^[7]，或者说是一种

对城市化过程拥有某种控制权的诉求，对建设城市和改造城市的方式具有某种控制权的诉求。城市人居环境建设首先应确定“人”的城市权利，其次才是“居”的话题的讨论。

2 “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其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影响

从行政管理体制的设置来看，“属地管理”和“行政发包”是中国政府体系的典型特征^[8]，它意味着中央政府并不直接干预地方层面的职能履行，而是采用委托-代理的方式，授权地方政府履行相关的政府职能。但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表现却饱受诟病，分权后，公共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水平并未相应提高，被认为是扩大社会差距、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因素。

“地方发展型政府”是指“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以推动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以长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为主要方式，以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的政府模式”^[9]。横向问责机制的不健全与纵向问责机制的有限性，进一步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自主行为空间，财政收益最大化成为地方政府行为的支配逻辑，社会政策常常成为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工具，这主要体现在“地方发展型政府”财政的生产性支出偏向^[10]。

经典财政支出理论认为，若所有社会成员得自公共品的边际效用之和等于提供公共品的边际成本，公共物品的提供就达到最优水平。在均衡状态，虽然各类公共支出的份额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但政府没有意图去改变财政支出结构，持续增加某类公共支出，即不会出现财政支出偏向。但现实表明，中国似乎存在生产性支出偏向，即财政决策偏向生产性支出。傅勇等^[11]运用1994年至2004年的省级数据研究发现，政府支出结构存在“重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倾向，而尹恒等^[10]在县级财政支出结构研究中也发现同样的问题。县级财政的生产性支出偏向严重地偏离了向公共财政转型的财政体制改革方向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

财政生产性支出的偏向主要影响城镇公共服务的水平，进而直接决定人居环境的供给层次，典型的症候就是“发展失衡”，即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社会问题不断累积，社会福利相对弱化或缺失的现象。对发展失衡中的政府责任问题这一命题的研究，公共服务是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因为政府主要借由投资(而非内需或创新)来拉动经济发展，这种财政的生产性支出偏向，形成了“政府投资 经济增长 政府投资

经济增长”的直接外部推动式的经济运行特征；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上出现了“公共服务提供不足

体制性消费不足 政府投资固化 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恶性循环，致使政府支出偏好也被相对锁定在“高投资、低服务”的结构上^[12]。这基本上成为当前中国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的制度基础。

3 政府责任、财政社会性支出与城市公共服务的公平性

福利性安排的弱化以及社会成本向民众转移累积，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国富与民生失调为特征的发展失衡问题，政府在财政社会性支出与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方面的失责成为研究的焦点^[13,14]。从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看，最大的争论在于所谓经济性支出与社会性支出(以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为主，也包括住房支出，如廉租房补贴等)的划分，并以“发展失衡 公共服务 政府责任”的逻辑体系展现出来。

从中国政府公共服务提供责任的实现程度趋势看^[12]，1980年代中国公共服务的现实提供量要高于理论上的应当提供量，政府责任实现程度在100%以上；但自1990年之后急剧下降，政府职能逐步向经济领域倾斜。经济转轨的条件约束也在相当程度上使得支出结构被锁定和固化，造成政府无力更多关注公共服务领域。但对于原本就处于劣势的城市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而言，依然存在着“社会-空间失配”问题^[15]。尝试公平地分配有限的城市公共服务是政府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管理者需要决定分配的成本和效益，但何为公平至今仍未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定义，但“不公平”是指公共服务或设施的分配对某些特殊人群有制度和体系上的歧视^[16]。江海燕等^[14]的述评研究发现，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公平性先后经历了地域均等(territorial justice)、空间公平(spatial equity)和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三个阶段，并在2000年之后开始质疑新自由主义过分重视市场而丧失公平的问题，提出重视公民权利、人文主义和民主价值的“新公共服务”理念，强调服务供给中的公平和平等目标，且这种公平是建立在满足多样化需求，保证适合某一群体也不排斥其他群体利益的基础上；城市公共服务从“地的公平”转为“人的公平”，从“地的丰裕”转为“人的丰裕”，着眼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和公正^[17]。针对同样因城市公共服务的社会空间失配而引发的伦敦骚乱(2011年8月)，戴维·哈维^[3]认为“问题是制度性的，而非个人”，针对穷人、弱势群体、法律上不受保护的人们而展开的剥夺，已成为这个政治经济制度的规则。

4 欠考虑政治经济制度的硬约束条件下的城市人居环境研究

4.1 从空间尺度上来看，城市层面的宏观分析逐步向社区深化

2004-2013年地理学视角的、且在城市层面上的人居环境研究重点为：(1)城市整体人居环境评价，(2)城市内部人居环境空间分异、结构、类型，(3)不同人群(不同国籍、不同经济状况、不同学历等)对城市宜居评价的空间差异，(4)人居环境心理空间分异(满意度、归属感、舒适度等)，(5)客观人居环境与主观居住空间偏好的关系^[2,18,19]。

社区是城市的基本构成单元，是居民日常活动的主要区域。其人居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居民的生活状态和城市的人居环境。尽管人居环境研究的视角逐步从城市层面向社区(或居住小区)深化，并更为关注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对其居住环境的主观感知(如归属感、安全感等)的分析^[20~22]。这一系列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当前城市甚至社区层面的人居环境质量以及主观评价如何”这个议题，焦点在“人或群体被动地接受外部人居环境并基于此有怎样的主观感受”，或者说主要探讨的是“人居环境在需求层面的反应”，并未触及到较为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制度等影响人居环境供给层面的分析。

4.2 从社会空间分异的视角，开始反思人居环境“供需失衡”问题

人居环境的“供给”主要源于财政的社会性支出结构，即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支持对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和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提供的公共服务^[23]，这直接受制于城市政体的主导意识形态。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后社会主义转型(post-socialist transition)背景下，城市社会阶层分化及居住空间分异呈显加速态势^[24,25]，但国内还少有研究对制度因素与人居环境的相关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

由于受到社会空间不平等与决策进程日益民主化的挑战，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居住隔离、社区退化、社会分异等问题将降低市民对人居环境的满意度^[26,27]；更需注意的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缺乏积极的联系，弱势群体被主流社会抛弃，被其他社会群体排斥，降低其就业和进步的机会。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新城市主义运动提倡各种收入水平和种族群体的充分融合，试图解决绅士化、贫困及犯罪等问题，他们认为社会多元化能够促进资源均衡分配，并且有助于创造更宽容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促进社区参与和邻里交流^[28,29]。进一步的研究认为，不同社会

群体的择居行为是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与住房成本之间的权衡^[30,31]。但从人居环境的角度来看,既往的研究均为在既定的经济发展理念以及城市政体的模式下的点滴的改良,当然这亦属不易;若从中国城市自1990年代中后期向新自由主义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空间后果的反思与检讨来看,基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城市权利的诉求重新思考公共服务型政府,以及政府决策日趋民主化的态势下,人居环境建设将不可避免地走上“一条包容多样性的、重新回到大众的民主管理之下的道路”。

5 与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相吻合的人居环境建设的新思路

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基于“人、土地和资本”这三个支撑;“人”不仅仅是劳动力的概念,而是在于怎样界定“人”且由谁来界定“人”,这决定着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走向,关乎社会包容性;土地是人居环境建设的空间支撑,涉及可持续性的议题;而资本(或资金)是人居环境建设在怎样的城市政体模式下运作的核心。

5.1 “城市尺度上以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供给”向“包容性的多样化社区需求的满足”转变

严格来说,未来5~10年内,中国城市从“发展型政府”向“包容型政府”的转型是社会结构性重组的必然要求^[32]。城市决定社区的本底,社区是城市的“细胞”,对社区建设和管理的投入占整个城市建设总投入的比例大小取决于政府的经营策略、对效益与公平的态度以及各种关系的相互博弈,换句话说,即受制于城市政体模式。“地方发展型政府”^[9]对社区的忽视是导致城市与社区空间割裂的重要原因,基于投资(而非需求)推动经济发展的制度设计,往往以牺牲社区利益为代价;城市宜居建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惠及到社区?其在各类型社区中的分配公平性又如何?这些成为新形势下人居环境建设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城市建设与社区营造构成人居环境的供需系统,但城市人居供需的非均衡成为一种常态,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剩”同时存在,社区需求得不到有效途径的表达;城市规划在编制层面上的公平性,因“地方发展型政府”在公共服务配置的“选择性实施”而发生偏离。有效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为何同时存在,资金投入是否用在居民认为的急需发展的民生领域,城市发展是否惠及社区,宜居建设是否兼顾了重点城区与边缘地带,是否存在阶层投入的严重不平衡?等,这些将成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基本话题,这是立场或价

值观层面上的,是第一要务。

5.2 城市层面上的“公众参与式预算”以及社区层面上的常住人口的“城市权利认可”

但若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问题(或者说财政社会性支出偏弱而导致的城市层面上的人居环境“社会空间失配”问题),需要逐步调整对上负责的垂直管理体制,逐渐增强政府对本地居民公共服务需求的敏感性和反应性^[33],也就是更多地倾听并满足来自本地常住人口对于公共服务的诉求,这一态势的转型需要的是政治体制上的重构,如Zhang等^[34]的研究发现,乡村直选提高了当地公共品的供给水平。就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而言,尽管仍存在着流程设计、推进机制以及参与绩效等问题,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于2013年,在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领域中引入公众参与式预算机制,预算编制从“为民做主”逐步向“让民做主”转型。

除城市层面上对涉及人居环境建设的公共服务的总量监控之外,更易出现偏差的依然是在社区层面,焦点是“非本地户籍常住人口是否具有参与社区营造的权利”,吴箫等^[31]在广州市新塘镇的实证研究发现,外来低收入群体需求最大的是住房、文化娱乐设施、出行方式,其次是商业网点,需求最小的是闲暇活动、环境污染治理等,而这一群体的诉求因与本地户籍人口差异较大,很难借助社区上升为城市层面的决策。

5.3 对于“城乡规划中的选择性实施”的监管与监督

从逻辑起源上来看,城乡规划在编制环节(即使在强调市场效率主导性的国情下),依然体现着对社会不同群体的生活质量公平性的保证;但在实施环节,却因“地方发展型政府”的选择性实施,即依照资本利润的空间偏好而有所侧重地进行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其中的“人”指的是有能力购买人居服务的需求者,而非有较低购买能力且急需人居服务的“需要者”。因而在当前的体制约束下,城市人居环境的“社会空间失配”问题缓解的核心抓手以及可操作性的措施是“城乡规划实施的督察”。尽管自2006年起已探索并初步构建了城乡规划效能监察体系,但实施效果不容乐观^[35]。

未来的5~10年时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将逐步由投资或政府支出推动向公民需求推动转型,城市政体模式逐步向法治社会的要求靠拢。法治社会是指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按照明确的法律秩序运行,并且按照严格公正的司法程序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法治民主的社会中,法律

和行政法规等由规范的民主程序产生和制订出来,并且其司法和执行过程通过规范的秩序受到全社会的公开监督。在法治社会的情势之下,决定城市不同人群的、不同的居住环境质量的城市规划是否被公平的实施将成为核心话题。

注释(Notes)

新塘事件发生于2011年6月10日的广东省增城市新塘镇大墩村,1名孕妇因占道经营阻塞通道,大墩村治保会工作人员劝其离开,双方因此发生肢体冲突,致使围观人员集聚,部分人员起哄,继而引发大规模的聚众滋事事件。详见:刘欢芳,刘玉亭。“大城镇”公共服务设施配置问题及其对策:以广州新塘镇为例.城市发展研究,2014,21(8):76-83。

所谓财政支出偏向,是指虽然政府必须平衡各方面对财政资金的需求,但他们内在地偏向某类支出,会尽可能将财政资金配置给这类支出。

福利制度是所有发达国家在经历长期经济增长后普遍形成的一种制度安排。从长期经验来看,经济增长与社会的福利化存在着正向关联。然而中国经济在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相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水平的提高,社会发展及福利安排出现了日渐弱化的趋势。

从公共支出角度来看,政府责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公共产品与服务,包括国防、公共秩序和安全等纯粹公共产品以及行政管理、立法等一般性公共服务;(2)优效品与服务(merit goods and services),主要是教育和健康服务,也包括住房和社区生活设施、娱乐和文化事务等;(3)社会保障和福利,也称为收入支持(income maintenance);(4)经济性服务,如具有较强外部性特征的农村基础设施等。

1990年代开始推行的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体制改革,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判断上,将公共服务更多地划给了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政府职能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出现了缺位,这也是导致政府公共服务提供责任的实现程度呈下降趋势并逐渐累积的重要原因。

城市公共服务(urban public services)和城市公共设施(urban public facilities)意义基本相同,均指由政府直接或间接为其公众提供并为所有人共享的服务和设施,详见参考文献14。

城市政体模式主要有发展型(development regimes)、中产阶级进步型(middle-class progressive regimes)或低收入阶层机会扩展型(lower-class opportunity expansion)等。其中“发展型政体”通过土地资源的运作来促进增长,通常由物质性成果来检验增长的结果;“中产阶级进步型政体”关注城市环境保护,城市历史文脉保留以及可支付的住房等;“低收入阶层机会扩展型政体”体现人文关怀,扩大低收入阶层的就业和创业机会。详见:Ward K. Rereading Urban Regime Theory: a Sympathetic Critique. Geoforum, 1996, 27(4):427-438。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吴良镛.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Wu Liangyong. Introduction to Sciences of Human

- Settlements[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1.
- 2 李雪铭, 夏春光, 张英佳. 近10年来我国地理学视角的人居环境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4, 21(2): 6-13.
Li Xueming, Xia Chunguang, Zhang Yingjia. Chinese Human Settlement Research with Geography Perspective in Recent 10 Years[J]. Urban Studies, 2014, 21(2): 6-13.
- 3 哈维·戴维. 叛逆的城市: 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M]. 叶齐茂, 倪晓晖,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Harvey D.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M]. Ye Qimao, Ni Xiaohui, Transla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 4 Wu F. Commentary-Transitional Cit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3, 35: 1331-1338.
- 5 勒菲弗·亨利. 空间与政治[M]. 李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46.
Lefebvre H. Space and Politics[M]. Li Chun,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46.
- 6 哈维·戴维. 后现代的状况: 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 阎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99.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M]. Yan Jia, Transla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3:299.
- 7 Mitchell D. The Right to the Cit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Fight for Public Space[M].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2003.
- 8 周黎安.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 官员激励与治理[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08.
Zhou Li'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 Incentive and Governance[M]. Shanghai: Truth & Wisdom Press, 2008.
- 9 郁建兴, 高翔. 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5): 95-112.
Yu Jianxing, Gao Xiang. Behavioral Logic and Institutional Basis of Local Developmental States[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2(5): 95-112.
- 10 尹恒, 朱虹. 县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1): 88-101.
Yin Heng, Zhu Hong. A Study of Productive Expenditure Bias in County-level Finance in China[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11(1): 88-101.
- 11 傅勇, 张晏.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 管理世界, 2007(3): 4-12.
Fu Yong, Zhang Yan. Chinese-Style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Bias of the Fiscal Expenditure: the Prices for the Competitive Local Growth[J]. Management World, 2007(3): 4-12.
- 12 吕伟, 王伟同. 发展失衡、公共服务与政府责任: 基于政府偏好和政府效率视角的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8(4): 52-64.
Lü Wei, Wang Weitong. Unbalanced Development, Public Services and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an Analysis Based on Government Preference and Government Efficiency[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8(4): 52-64.
- 13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增长失衡与政府责任: 基于社会性支出角度的分析[J]. 经济研究, 2006(10): 4-17.

- Research Group of Economic Institute of CASS. Growth Imbalance and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Expenditure[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6(10): 4-17.
- 14 江海燕, 周春山, 高军波. 西方城市公共服务空间分布的公平性研究进展[J]. 城市规划, 2011, 35(7): 72-77.
Jiang Haiyan, Zhou Chunshan, Gao Junbo. Advance in the Equity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in Western Countries[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1, 35(7): 72-77.
- 15 丛艳国, 夏斌. 广州市人居环境满意度的阶层分异研究[J]. 城市规划, 2013, 37(1): 40-44.
Cong Yanguo, Xia Bin. Study on Difference in Satisfaction Level on Human Settlements by Different Social Stratum in Guangzhou[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3, 37(1): 40-44.
- 16 Smith D M. Geography and Social Justice[M]. Blackwell, Oxford, 1994.
- 17 Cho Chun Man. Study on Effects of Resident-Perceived Neighborhood Boundaries on Public Services Accessibility and Its Relation to Utilization: U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Focusing on the Case of Public Parks in Austin, Texas[D]. 2003.
- 18 刘沛林, 廖柳文, 刘春腊. 城镇人居环境舒适指数及其组合因子研究: 以湖南省长沙县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5): 769-776.
Liu Peilin, Liao Liuwen, Liu Chunla. Urban Residential Amenity Index and Its Composition Factors: the Case of Changsha County in Hunan Provinc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3, 32(5): 769-776.
- 19 祁新华, 程煜, 陈烈, 等.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规律: 以广州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08, 27(2): 421-430.
Qi Xinhua, Cheng Yu, Chen Lie, et al. The Evolvement Rules of Human Settlements System on Metropolis Fringe: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8, 27(2): 421-430.
- 20 李雪铭, 刘巍巍. 城市居住小区环境归属感评价: 以大连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06, 25(5): 785-791.
Li Xueming, Liu Weiwei. An Estimation on the Sense of Belonging of City Housing Plot Environment: Taking Dalian as an Exampl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6, 25(5): 785-791.
- 21 杨俊, 李雪铭, 李永化, 等. 基于DPSIRM模型的社区人居环境安全空间分异: 以大连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12, 31(1): 135-143.
Yang Jun, Li Xueming, Li Yonghua, et al. Assessment on Spatial Differences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Communities Based on DPSIRM Model: the Case Study of Dalia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1): 135-143.
- 22 李雪铭, 张建丽, 杨俊, 等. 社区人居环境吸引力研究: 以大连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12, 31(7): 1199-1208.
Li Xueming, Zhang Jianli, Yang Jun, et al. Analysis of the Attraction Field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s: a Case Study of Dalia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7): 1199-1208.
- 23 李敏纳, 覃成林. 中国社会性公共服务空间分异研究[J]. 人文地理, 2010, 25(1): 26-30.
Li Minna, Qin Chengli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Social Public Services in China[J]. Human Geography, 2010, 25(1): 26-30.
- 24 宋伟轩, 吴启焰, 朱喜钢. 新时期南京居住空间分异研究[J]. 地理学报, 2010, 65(6): 685-694.
Song Weixuan, Wu Qiyan, Zhu Xigang.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of Nanjing in the New Period[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65(6): 685-694.
- 25 刘望保, 闫小培. 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类型分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 CGSS(2005)的分析[J]. 地理学报, 2010, 65(8): 949-960.
Liu Wangbao, Yan Xiaopei. Housing Type Vari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ransitional Urban China: Based on Analysis of CGSS 2005[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0, 65(8): 949-960.
- 26 M Carvalho, V George R, H Anthony K. Residential Satisfaction in Condomínios Exclusivos (Gate-Guarded Neighborhoods) in Brazil[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97, 29(6):734-768.
- 27 R Kleinhans. Social Implications of Housing Diversification in Urban Renewal: a Review of Recent Literature[J].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2004, 19(4):367-390.
- 28 E Talen. Neighborhood-Level Social Diversity: Insights from Chicago[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2006, 72(4): 431-446.
- 29 苏振民, 林炳耀.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控制: 居住模式与公共政策[J]. 城市规划, 2007, 31(2): 45-49.
Su Zhenmin, Lin Bingyao. Control over City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Residential Model and Public Policies[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7, 31(2): 45-49.
- 30 K Brueckner J, F Thisse J, Y Zenou. Why is Central Paris Rich and Downtown Detroit Poor? An Amenity-Based Theory[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43:91-107.
- 31 吴箫, 程金屏, 钟式玉, 等. 基于不同主体的城镇人居环境要素需求特征: 以广州市新塘镇为例[J]. 地理研究, 2013, 32(2): 308-316.
Wu Jing, Cheng Jinping, Zhong Shiyu, et al. Empirical Research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Elements Based on the Needs of Different Subjects: a Case Study of Xintang Town, Guangzhou[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2(2): 308-316.
- 3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 中国: 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J]. 管理世界, 2014(4): 5-41.
Research Group of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World Bank. China: How to Promote an High-Efficiency,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J]. Management World, 2014(4): 5-41.
- 33 Bardhan P, Mookherjee D. Capture and Governance at Local and National Level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0, 90(2):135-139.
- 34 Zhang Xiaobo, Fan Shenggen, Zhang Linxiu, et al. Loc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12):2857-2871.
- 35 魏立华, 刘玉亭. 城乡规划的“执行阻滞”与规划督察[J]. 城市规划, 2009, 33(3): 44-49.
Wei Lihua, Liu Yuting. "Implementation Block" of Urban-Rural Planning and Planning Inspectorate[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9, 33(3): 44-49.